

● 新探索

我国体育外交演进的历史逻辑与观念变革

尹晓亮¹, 刘连发²

摘要 体育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载体。“乒乓外交”、“亚运外交”、“奥运外交”等体育事件是我国公共外交政策的外在表现,从“打开封锁”到“和谐世界”是我国体育外交观念演进的历史逻辑,背后昭示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结果告诉我们,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外交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中国树立了体育外交新的典范。体育外交观念演进带给我们的启示包括: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用好精英力量发挥外交特使作用;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产品,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乒乓外交”;公共外交;外交政策;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关系;经验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6)04-0053-06

DOI:10.13598/j.issn1004-4590.2016.04.009

Historical Logics and Conceptual Changes in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Diplomacy in China

YIN Xiaoliang¹, LIU Lianfa²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2. Department of Police Tactics and Command of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Sports,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public diplomacy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we have trawl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logics and conceptual changes in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diplomacy with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s clues. We believe that: “Ping-Pong Diplomacy”, “Asian Games Diplomacy”, “Olympic Games Diplomacy” and other sports events are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policies, and the process from “opening the blockage” to “harmonious world” is the historical logics behin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sports diplomacy in China, demonstrating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The conceptual changes in sports diplomacy arise mainly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The results of evolution of sports diplomacy policies tell us that sports diplomac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ublic diplomac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a new pattern of sports diplomacy has been set with major sporting events as the carrier. With the help of the sports exchange platform, we can tell the good story of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ublic diplomacy of sports and make use of the elite force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 special envoy; br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 sports diplomacy as a national spokesperson and strive to have a say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We should launch traditional sports events with out own characteristics, form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and vigorously support sports organizations run by overseas Chinese and strengthen foreign aid in sports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the revel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diplomacy.

Key words “Ping-Pong Diplomacy”; public diplomacy; foreign policies; major sports events; public relations;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

收稿日期:2016-05-09

作者简介:尹晓亮(1979-),男,安徽阜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1. 安徽农业大学 体育部,合肥 230036; 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警务战术指挥系,北京 100038。

“观念”一词在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等美国外交学者看来指的是“个人所拥有的世界观、因果关系、原则信念等变现的信念”^[1]。我国学者杨晓萍(2012)将其定义为“主体人对客观事物的看法”^[2]。笔者在文章的理论构建中倾向于第二种看法,观念与外交行为和实践相互影响,观念即通过决策者的认识指导外交行为,外交行为也通过实践影响观念认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外交逐渐兴起,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体育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学术界目前没有关于“体育外交”的认证和完善的理论建构,但是体育外交活动所发挥的实践作用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育外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鉴于此,本文以公共外交为切入点,对体育外交演进的历史逻辑和观念变革进行梳理,以期对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1 历史进程与路径:从破冰之旅到普世的人文情怀

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演进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紧密相连,特别是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角色背景高度相关。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封闭、对抗的心态,到今天的自信、合作、共赢,体育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基于我国外交演进的整体背景以及体育外交的具体事件,体育外交的观念变革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1 第一阶段(1949—1978):以打破封锁为目标,以项目为载体,通过“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受到了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势力的封锁和挤压。此时的外交观念集中在反侵略、反压迫。其指涉具有明显的“敌”、“友”观念,对于世界的划分也多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东风”和“西风”等。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二元世界划分,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观念和身份认知呈现对立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状态^[3]。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期,前苏联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与美国抗衡的实力,美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逐渐缩小。此时的苏联已经具有霸权主义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在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这一系列的举动致使地区之间冲突的

压力进一步提升。此时的美国正在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之中。在国际间的利益格局中前苏联的进攻态势明显而美国却逐渐陷入了防守的境遇,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政府试图联合中国以遏制苏联的战略扩张。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第31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于1971年3月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时任亚乒联主席的后藤钾二先生不顾外部势力的阻挠多次向中国发出邀请函,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代表队参加本届世乒赛的比赛。在这期间后藤钾二先生亲赴北京商谈比赛细节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出队伍参加世乒赛^[4]。在参加世乒赛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展示了良好的形象和竞技水平,在这期间美国队也与中国队有了密切的接触,并向中国队的队员示好。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做出“同意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决定。这一历史性的决定震惊了白宫,也震惊了世界。1971年4月10日美国代表团一行15人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获准入境的美国人。周恩来总理充分利用“乒乓外交”所创造的机遇向美国发出了友好的声音,紧接着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此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在华期间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此后中国乒乓球队也于1972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回访。“乒乓外交”作为冷战时期实现“破冰之旅”的独特形式,已经远远超出体育交流的意义。“乒乓外交”以独特的手段对当时美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反馈,使中美两国实现了政府及官员之间的对话。此后以中美“乒乓外交”为基础新中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之门,开创了全新的国际关系。

1.2 第二阶段(1979—2000):以区域赛事为载体,展现发展成果,向负责任的大国转向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政策,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纷纷面临瓦解和政权更迭的命运,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更是带来了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同时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质疑社会主义阵营的声音,此时西方国家再次掀起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西方媒介对中国的报道多集中在负面的或者恶意的攻击。面对国际环境的改变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和对外政策有变化”的“两个重要转变”。同时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5]。自此中国开始打破自我封闭的局面,开始向“对外开放”的观念转化。打破西方的经济制裁与政治封

锁,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外交工作的核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第11届亚洲运动会于1990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视。亚运会的举办为中国展示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亚运会期间有60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同场竞技,通过各种媒介关注北京亚运会的人员高达数亿,到中国观赛和旅游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的机会,借助“亚运外交”中国再次掀起了对外交往的热潮,亚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先后与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亚运外交”为中国开辟了新的路径。此后一系列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区域性体育赛事相继在中国举办,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1.3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以全球性赛事为载体,体现制度自信,构建普世的人文情怀,向和谐世界观念转化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致使美国东移战略受到反恐战略的影响而迟滞,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年中国政府加入WTO,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需要革新理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05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提出展现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体现了普世的人文情怀。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营造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早在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后,我国政府就以亚组委为核心成立了奥组委申办奥运会,这一决定得到了高达92.63%的国民的全力支持,这期间虽然经历了2000年奥运会申办失败的挫折,但是最终中国北京成功锁定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承办权,并将“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的核心理念,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精神上的饕餮盛宴。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示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四大发明、击缶而歌、丝绸之路、《论语》、太极……一系列的中华文化符号向现场的9万多观众和通过媒介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全世界约20亿人民进行了展示。奥运会举办期间有2万多名记者和4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北京。中国用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人民,同时也“全景观”地展示

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体现制度自信崇尚和平的现代中国形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再次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也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2 观念变革的动因:内政需求与外部环境的强力驱使

2.1 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是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动力

中国体育外交的形成与发展背后折射的是新中国从成立走向富强的历程,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的变迁推动了中国外交方针和战略的演进。体育作为独特的交往形式在国家交流与对外交往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体育作为外交方式的演进与国家的整体外交观念的演进密不可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外交观念的变革与体育外交观念的体现经历了三个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在以西方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隔离的国际环境影响下,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1969年以后面对前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试图联合中国以抗衡和牵制前苏联的崛起,新兴中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打破封锁,走出去”成为建国初期外交策略的核心。体育外交的观念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乒乓外交”为契机,推动小球转动地球。实现中美建交,并掀起了新中国外交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打开封闭之门,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第二阶段(1979—2000),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瓦解,中国再次被推向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的经济封锁依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内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对时代特征做出了准确定位,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国家利益确定为外交活动的最高准则,做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判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倡导国际和关系民主化,主张世界格局的多样性。此时的体育外交观念体现为展示新兴大国的力量与制度优势,通过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增进交流互信,突破经济封锁。第三阶段(2001至今),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的质疑同步存在,外交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权、内政以及民族事务干预不断,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威胁依旧存在。我国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明确了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增强公众外交意识,构建民主平等,互利互信的“和谐世界”,提倡“和而不同”的国际格局,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承担国际使命和义务。体

育外交观念表现为通过举办全球性的体育赛事,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核心,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追求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念,展示制度自信,通过全球性的体育赛事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融合与密切合作,进而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外交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外交观念的变革始终受到国际环境和内政需求的影响。从“打破封锁”到实现对话与合作,从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中国外交观念的变革始终与世界环境变迁紧密相连。一个外交理念的提出是具有阶段性的,外交的最终目的是为内政服务的,因此内政驱动和需求是中国外交观念变革的原动力。

2.2 体育外交活动营造的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场域,为展示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在冷战时期体育交流活动作为外交手段率先打破了“对抗”之门,促使本为“敌对”关系的国与国之间实现了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点正如南非总统曼德拉所言:“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对于中国的外交观念的变革而言,国内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的促动是观念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往往通过体育交流等活动率先打破沉寂,体育赛事更是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比如以亚运会为契机中国就先后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越南等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而在奥运会期间中国以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成功回应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展示了中国形象,同时也成功地传播了中华文化,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程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一直与中国发展同行。为了舒缓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疑虑,中国的外交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做出向“负责任的大国”的重心调整。围绕这一战略,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承诺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着眼构建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并在国际社会倡导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和谐世界”战略构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观念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奥运会举办正是对“和谐世界”外交观念的综合诠释,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构建的“和谐世界”外交观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以及和而不同的国际格局建设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全面概括。这一点与体育运动所追求的“和平”理念相互契合,体育外交活动营造的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场域,为展示中国形象和

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是体育外交观念演进的动力之一。

3 政策演进与实践探索:体育外交承担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合作的先行力量

3.1 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方向性演进。从国家化格局来看,中国则实现了从“两大阵营”向“多极化格局下的和谐世界观”演进。现在看来,中国外交史上的观念转型是推动中国由自我封闭的国际舞台的“边缘者”到国际舞台核心位置的“利益攸关方”的关键^[6]。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外交进入了大调整时期^[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要变革。20世纪80年代,国内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政策,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改善了与美国、苏联、日本的关系,与美国拉开了距离,不搞战略结盟,改善了与前苏联的关系,以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加强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20世纪90年代,国内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做“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并发挥主动作用,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建立伙伴关系,改善国际形象。21世纪初,国内提出“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在国际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在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全面融入世界,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一员并占据核心位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从宏观的历史阶段来看,体育对外交往活动在国家公共外交中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对国家公共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冷战时期的打破封锁,把“乒乓外交”作为中美两国在对立时期开展交流活动的主体,打开了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的大门,为进一步增进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体育作为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学术界虽然没有关于“体育外交”的认证和完善的理论建构,但是体育外交活动所发挥的实践作用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8]。以体育活动为载体进行对外交流符合公共外交的基本特性,体育外交活动在我国的外交实践中已经形成一种灵活有效的模式,在改善国际环境中的作用与日俱增。

3.2 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形成了体育外交政策与

实践双向驱动,树立了体育赛事的外交典范

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的时期内难以消弭。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中国的崛起势必引起他国的关注,特别是其他国家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和目的产生理解和认同,势必产生误解和恐慌,甚至将中国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9]。这也必将中国与西方一些崛起的大国相提并论,因为西方的一些大国的崛起是依靠战争和掠夺实现的。比如:法国、英国、德国等。消弭“中国威胁论”,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活动的核心。由于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增进国际间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构建国际交流的广阔平台是现代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从建国初期的“乒乓外交”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借助区域性比赛展示国家形象,再到以全球性体育赛事为平台构建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念进而展示制度自信、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的真实写照。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树立了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的外交典范。在北京奥运会上参与开幕式的各国政要就有106名,其中国家元首级的领导人有81人,创造了历届奥运会之最。奥运会期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先后与70多个外国首脑举行了外交活动,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10]。北京奥运会树立了中国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广泛开展外交活动的典范,此后的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2011年的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2015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等一系列的大型体育赛事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和民间外交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外交成果。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飞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境外出席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11]。这更是我国体育外交传统的延续,“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习总书记的体育外交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习总书记的“点穴式”体育外交^[12],突出了短、平、快的特点^[13],是对体育强国梦、中国梦以及“和谐世界”的生动诠释。中国借助大型体育赛事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性的真实形象,真实中国国家形象与外交理念的展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

4 经验与启示:以体育外交为载体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全面融合互动

4.1 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体育外交的实践与观念变革是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整体需求的,体育外交活动也构成了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大型体育赛事所提供的交流平台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打破封锁到利用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从而展示制度与文化的自信,变革背后的驱动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与格局的剧变。概括而言,对于体育外交而言其政策演进的历史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为不同国家和种族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打破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进而消解“中国威胁论”,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表达“和谐世界”的文化外交观念,形成普世的价值认同。第三,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体育比赛也是和平的象征,体育比赛提供了全世界目光聚焦的机会,借助体育赛事所营造的交流平台宣传中国文化,实现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认同,进而实现“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4.2 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用好精英力量,发挥外交特使作用

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融合,这一融合的过程也是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逻辑过程。新时期我国体育外交的时代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促进体育外交与国家外交观念的有机融合,进而服务外交全局;第二,以体育交流为载体促进多元参与主体的深入交流;第三,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为目标,促使体育外交观念的不断转化。近年来,我国体育借助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国际性体育赛事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理解与认同,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但是中国的体育外交仍然没有建立系统长效的机制,体育外交的公共效果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此体育外交应该在公共外交发展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载体作用,增强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国家战略服务。此外,对于体育外交而言,更应该用好精英的力量为国家外交战略服务^[14]。体育领域的精英运动员往往具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往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往往具有“普世性”。对这些精英运动员进行人力资源整合,通过体育院校与外交专业院校的力量对其进行专门培养,为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服务。

4.3 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体育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形象代言人的

角色,冷战时期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通过体育外交展示国家形象。国家重大体育赛事的参与者不仅代表着所属国的形象,还是一个国家文化、精神与综合国力的集中展现。体育明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出现,还承担着外交使者的新形象。比如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就这样评价姚明加入 NBA,他说:“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用活力、微笑、自信和集体精神赢得了公众的赞赏,几年内他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和民族的象征。”^[15] 姚明用他的自信和睿智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运动员刻板 and 锦标主义的一贯看法,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建立了新的认知。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布鲁克·拉尔默曾经这样评论:“姚明和王治郅的美职篮(NBA)之旅,隐喻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外交发挥的作用也跟国家体育话语权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也关乎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我国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差异在国际高层体育组织的任职人数相对较少。数据显示“在奥运会的 28 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我国仅有 30 余人在 10 个单项体育组织任职”^[16]。近年来这一数据虽然也有改观但是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是中国体育外交带给我们的启示。

4.4 努力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努力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是保持民族文化内涵的关键举措。“地理标志性”产品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符号的高度浓缩。印度的“瑜伽外交”以及瑜伽成功的国际推广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华人海外体育组织以及对外体育援助人员是弘扬国家文化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使者。华人群体身居异域他乡更能体会族群认同的重要价值和价值,每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海外的华人群体都要进行传统体育项目的展演,这为国外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同海外华人体育组织,使其为改变国家形象和我国的公共外交服务。因此中国的体育外交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应该构建全民参与的“平民外交”以加大对外交流交往的力度,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精英主流和民众全面参与的外交局面,从而进行文化输出获得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第二,拓展体育文化内涵,努力打造自身特色的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第三,进一步提升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构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此外,加强

留学交流活动,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是新时期体育外交的重要领域,在请进来的人群中要不断加强留学生的培养水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的原则指导下搞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17],特别是要加大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对外交流和援助的力度。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育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乒乓外交”、“亚运外交”、“奥运外交”等体育事件是我国公共外交政策的外在表现,从“打开封锁”到“和谐世界”是我国体育外交观念演进的历史逻辑,背后昭示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结果告诉我们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外交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树立了体育外交新的典范。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用好精英力量,发挥外交特使作用;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体育外交观念演进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杨晓萍. 新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4):56-59.
- [2] 俞大伟, 张晓义, 罗琳. 挑战与机遇:18 年一个节点的中国体育外交“三部曲”[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18-21.
- [3] 吴学文. 外交之圣周恩来——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读“乒乓外交”史料的感受[J]. 中日关系史研究, 2010(4):40-52.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26.
- [5] 王洪飞. 我国体育外交的特点及策略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12):1-5.
- [6] 李舜意, 熊锦平. 后奥运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J]. 体育学刊, 2012(2):21-24.
- [7] 李学保.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外交观念变革的历史路径及经验启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6):28-32.

(下转第 47 页)

需求,不能有失偏颇,拉大体育参与的社会距离。

5 结语

体育与国家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表征实践过程,既有意象符号、书写符号和真实符号。体育与国家形象发生关联的机制包括不同社会对冠军的需要,体育符号经过提喻处理后跃升为象征符号,而象征符号是传达国家政治行为的载体。舒盛芳^[21]在考察日本、美国、德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与政治后发现,体育的崛起成为大国崛起的信号和象征。竞技体育能力内嵌于国家的形象,片面化的体育竞技感知能放大国家象征意义。中国竞技体育早期的优先崛起和“赶超型”战略消除了国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象。体育象征国家形象具有多重性,随着时代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不能期望惯习的体育符号与国家形象完全匹配,应及时对体育象征符号进行调适。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路径有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构建国家、个人的体育话语能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汤筠冰. 被观看的中国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10(2): 20—24.
- [2] 赵爱慧. 伦敦奥运会报道与国家形象塑造——以《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报道为例[D]. 济南: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 [3] 万晓红. 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柏林奥运、东京奥运以及北京奥运为样本[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4] 舒盛芳. 体育软实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2): 67—69.
- [5] 孙娟, 付常兵. 试论体育软实力[J]. 体育文化学刊, 2009(6): 6—9.
- [6] 袁大任. 强化中国体育软实力可选方案[J]. 体育文化导刊, 2009(1): 1—2.
- [7] 程林林. 发展国家体育软实力的思考——基于文化交集和通约的视角[J]. 体育与科学, 2012(5): 1—6.
- [8] 李登. 体育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特性研究[D]. 武汉: 武汉体育学院, 2015.
- [9] 王忠杰, 崔国文. 体育软实力的逻辑层次及提升路径[J]. 体育学刊, 2013(5): 29—32.
- [10] 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M]. 北京: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23.
- [11]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391—392.
- [12] [16] [17] 翟明安. 象征人类学理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 208, 109.
- [13] 张欢华. 作为符号实践的体育[J]. 社会, 2003(5): 60—62.
- [14] 维克多·特纳. 庆典[M]. 方永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8.
- [15] Ninth Editio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11: 366.
- [18] 埃德蒙·利奇. 文化与交流[M]. 卢德平, 译. 华夏出版社, 1991: 16.
- [19] 郎平. 激情岁月[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 [20] 谢琼桓. 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11): 5—9.
- [21] 舒盛芳. 大国体育崛起及启示——兼论中国体育“优先崛起”的战略价值[J]. 体育科学, 2008(1): 76—81.

(上接第58页)

- [8] 俞正樑, 等.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73—274.
- [9] 凌平, 南音.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J]. 体育与科学, 2006(1): 10—13.
- [10] 任海军, 吴黎明. “贺喜”索契冬奥, 公共外交新创举[EB/OL]. [2016-02-2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07/c_119234505.htm.
- [11] 曾伟, 谭洁羽. 解读习近平“点穴式”外交有何特点[EB/OL]. [2016-02-20]. <http://news.sohu.com/20140826/n403796949.shtml>.
- [12] 刘盼盼, 刘纯献, 冉祥华. 习近平主席索契冬奥会之行看体育与外交的相互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12): 1—6.
- [13] 刘玉亮, 张勤. 我国竞技体育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J].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1): 5—8.
- [14]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 当中国改变世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28—29.
- [15]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加强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的意见[EB/OL]. [2016-02-20]. http://htzl.china.cn/txt/2005-06/13/content_5888539.htm.
- [16] 刘冠楠, 陈刚. 论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的任务[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11): 16—20.
- [17] 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O·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16.